



8月10日,赵登用的父母和妻儿在家。一家人的生活已经改变。

新京报记者 刘刚 摄

(上接A14版)

## 两兄弟“大海捞针”

站工的老乡都不认得赵登用。后来,两兄弟说,就是“爆炸那个”,老乡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。

回想起来,当初寻找线索,赵登红形容“大海捞针”。

事后赵登用总结,如果当初走访时带张赵登用的照片,效率说不定会更高。

兄弟两人先找到了赵登用在县城租住的房子。一些细节被他们捕捉到:挑沙的箩筐摆在角落,没吃完的饭在电饭煲里,吃菜的蘸水摆在桌子上。

在今年4月回老家之前,曾建花跟着丈夫赵登用住在巧家县城。据她描述,一般赵登用上午去劳务市场站工,有活就干,没活就开“摩的”拉客。这几年,挑砖、卸货、送水这类体力活,赵登用几乎都做过。

赵登用站工的劳务市场,在巧家县红卫街灯塔下面。大马路两边,聚集着等活的人们,或坐或站,三五成群。

5月14日,赵登红兄弟两人上前发烟,跟人套近

乎,问认不认得赵登用。

这一天,巧家县公安局长以前程向媒体保证,“这个案子是赵登用所为”。

在劳务市场,站工的老乡都不认得赵登用。后来,两兄弟说,就是前两天“爆炸那个”。这样一说,话匣子就打开了。

靠这样的方法,两兄弟找到了站工的赵登红。赵登红说,5月10日早上7点,他曾在劳务市场见过赵登用,后来去吃早饭,回来就再没见到。

到5月19日,赵登贤找到工友所说的“最后一个见过赵登用”的人,林国才(音)。林说,那天早上7点多,他和赵登用在内的4个人,被一个老板叫到马家桥牵牛,价格不合适,没谈成,“工人开价50元,但老板只愿给25元。”

后来赵登用和林国才一起回到劳务市场,坐在那里等活。

林国才说,赵登用是被一个40岁左右背双肩包的男子叫走的。没隔多长时间,便发生了爆炸。

那男子的双肩包什么时候到了赵登用的背上,又怎么背去了花桥社区,不得而知。

掌握了这样的信息,赵登贤立即反馈给了县公安

局。对方说,正在着手调查。

“如果预谋报复社会,他怎么还会有心思去站工,到处去见工?”赵登贤说。

## “做啥子都没得心思”

爆炸案后老两口再也没下过地,没心思,地里的苞谷还没杂草长得高

找到林国才的时候,赵登贤“心底掠过一丝惊喜”,他说他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目击者。

5月20日,赵登贤“心里压着块大石头”离开了巧家县,回了曲靖市打工的煤矿。

大哥赵登结回到昆明,发现从地上捡的报纸,都是赵登用的新闻。“干活路也没得心思”。

赵登贤给母亲打电话,告诉了她从林国才那里听来的消息,让母亲多去公安局打听打听。

这些内容没敢告诉父亲赵举朝。5月15日一回到张家梁子的土屋,赵举朝就躺下了,“做啥子都没得心思了”。

老两口再也没有下过地。到8月,苞谷地里长满杂草,黄兴聪说,“苞谷还没杂草长得高”。这一季的庄稼

是没希望了。

去巧家县城配合调查,顾不上家里牲畜,回家后又精神恍惚,家里的猪死了一头,还死了3只羊2只鸡。

这还招来两个老人的争吵。赵举朝责怪黄兴聪不会看管,黄说忙不过来,还要抱娃娃。

“老人无法,照管不了,路都站不起来走了。”赵登贤说,家里一头猪奔出猪圈,蹿到别的村民家里去了,人家要求挂红。“挂红”是当地的一个习俗,认为陌生事物突然闯入家门不祥,要挂红绸以辟邪。

“只要一看见儿子做的农具,就忍不住伤心。”赵举朝不会形容自己,半天,反复着“伤心”、“难过”两个词。

赵举朝晚上睡不着,想起老三,就起来抽叶子烟。他说,这三个月抽的叶子烟,比前两年加起来都要多。

赵登用是家里的壮劳力,家里有重要的事,都得他回家干。

今年春节到爆炸案发生,赵登用回过3次家。正月里,赵举朝上山砍柴,不小心滚下山受伤,赵登用回家送父亲看病。第二次回家是种洋芋。最后一次回家是4月24日,把妻子和儿子送回老家。买了2头猪,希望以后卖了盖新房。

## “我儿子也是受害者”

黄兴聪说,工作组还将部分村民召集到院坝,解释赵登用未参与预谋爆炸,并向家属道歉

3个月后,8月7日夜里,巧家县公安局人员和包谷垴乡的干部一共七八人,摸黑上了张家梁子。工作组给黄兴聪带来2000元慰问金和一份通报。

“他们说,我儿子也是受害者。”黄兴聪回忆,工作组还将一个小组的村民召集到院坝里,解释赵登用并未参与预谋爆炸,并向家属道歉。

曾建花现场提了要求:爆炸案的两个主犯给赵家磕头谢罪;公安局长杨朝邦向家属道歉;两个爆炸案主犯要承受赵登用一样的痛苦和惩罚。这些要求现场没有得到答复。

二哥赵登贤很早就知道了相关信息。

7月18日,他在腾讯微博上说:“无辜的平民:告诉你一个消息,巧家‘5·10爆炸案’不是赵登用所为,经公安部督察破案,是征地钉子户姓宋的两个人作案。已被逮捕,政府不敢公布……”

次日,巧家县公安局民警找到了在曲靖的赵登贤。“警察拿了5000块钱和一些给小孩的营养品给我母亲。给我换了一部手机和电话卡,让我不要找记者,说最近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”

8月6日夜里开始,赵登贤的手机异常繁忙,各地的记者都在给他打电话。

9日下午,巧家县公安局和乡政府的干部又到了赵家,说给6万救助款。“他们说这个钱,可以给,也可以不给。”家属拒绝了。

次日一大早,赵登贤爬起来,列了一张索赔表,包括精神损失、名誉损失在内,超过100万元。下午交给了巧家县公安局纪委书记罗学林。

最后一条要求,赵登贤原本写的是“按照农村风俗习惯,公安机破坏家属的大门,要求亲自上门‘挂红’”,考虑了一会儿,又删除了。

如果公安不理睬,要不要打官司?赵家人很纠结,最终觉得要讨个说法,筹划着要请北京的律师。

已是立秋,山腰上的核桃快要采摘了,树高坡陡,老人上不了树。黄兴聪说,以前都是老三干。说着,不自觉就哭了起来。

(实习生赵力对本文亦有贡献)